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态势及其特征

朱 汉 国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875)

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 20世纪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随着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新时期改革开放三次历史巨变, 中国社会开启了从传统全面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民国时期, 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一个时段, 其显著的标识, 即是社会结构和民众社会生活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日趋转化。

按照社会学理论, 社会结构包括社会形态结构、社会群体结构等不同层面。社会形态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主体结构, 社会性质、社会面貌主要是由社会形态结构所决定的。社会形态结构, 就其内涵而言, 又可分为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等方面。民国时期, 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一个显著态势, 即是社会形态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其变动, 首先反映在政治结构上, 不仅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 创建了民主共和政体, 而且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 完成了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向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渡, 真正从政治理念上摒弃独裁专制政体, 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其次反映在经济结构上, 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资本主义经济在城乡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取代了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成为中国的主导经济, 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旧有经济结构。此外, 社会形态结构的变动还反映在思想文化结构上, 逐渐完成了社会主体意识形态从传统儒家文化到三民主义再到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更替过程。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结构的这些变动, 充分表明了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形态结构已由被奴役的、分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独立的、民主的、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社会群体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社会群体包括家庭、宗族、民族、社区、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等。民国时期, 在社会形态结构变动的过程中, 社会群体结构也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社会群体结构的变动, 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社会群体自身结构的变化。民国时期, 无论是家庭、宗族等原有社会群体, 还是商会、工会、农会等新兴的社会群体, 其自身结构都发生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变化。如在家庭结构中, 虽在民国时期的城乡中仍存在着传

统的多代同堂的大家庭, 但一夫一妻及其子女组成的小家庭, 已是中国家庭的主要模式。特别是在民国期间发展起来的政治团体、职业团体以及文化团体, 已打破传统社会团体中的地域观念和家长制管理模式, 开始采用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民主管理制度来构建自己和发展自己。

第二, 社会群体间的流动。由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异常尖锐, 民国时期的社会群体流动在阶级、阶层之间。在此期间, 其流动出现了以往未见的三个走向: 一是大量破产农民流向城市, 成为新兴产业工人的主要来源; 二是一部分传统的富有阶级, 如官僚、地主开始投资于工商业, 成为新兴工商资本家; 三是随着新式学校的开办, 出现了数百万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

第三, 社会群体对社会的影响与作用。较传统社会, 民国时期的社会群体结构, 不仅在组织形式上出现了横贯全国、纵贯中央和地方的社会组织, 而且在社会作用和影响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民国年间, 就其社会群体组织对社会的影响而言, 莫过于建立在阶级之上的政党和派别。从民初政争到国民党一党独裁政治, 进而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无不说明政党对社会的影响至深。而政党对社会发生影响, 正是近代社会各国政治的普遍现象。

应该说, 民国时期社会群体结构的上述向现代转型的态势, 与社会形态结构的变动是一致的, 它们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社会结构转型的基本动向。

民国时期, 中国社会的转型, 还突出地表现在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在逐渐地走向现代。所谓社会生活方式, 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 社会成员价值观所导致的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全部生活动力的稳定形式。一般而言, 社会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和交往生活方式。

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 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民国时期, 随着西俗的流传, 中国城乡民众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式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在衣着上, 虽然早在20世纪初, 中国已有人中装西服混穿, 但一般限于城市上层社会。进入民国后, 虽在广大乡村民众大多仍着中国传统服饰, 但在城市中, 不仅上层社会流行西装, 一些平民百姓的服饰也趋于中西合璧。

西式饮食的输入及其影响的日益扩大, 使中国饮食业在民国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突地表现在以下

几方面：一是打破了中国饮食业的旧有格局，确立了新的饮食体系。“番菜”、“番点”、“洋烟”、“洋酒”大量地出现于中国饮食市场，与中国的川、鲁、粤、淮、扬等著名大菜系的美味佳肴，以及中式糕点、白酒黄酒交相辉映。全国各大地区都出现了西餐馆和西点店，西式食品成为中国饮食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丰富了中国饮食品种，完善了中国饮食结构。中菜与西菜在用料、烹制方法、乃至食用方式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中菜、西菜在品种和口味上有着很大的不同。西餐传入中国使中国厨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的顺应潮流者积极地吸取了西菜的长处，在西方烹饪精华的基础上创制出了大量的中国名菜。一些中菜馆菜单上的“西法鸭肝”、“西法大虾”、“纸包鸡”、“华洋里肌”、“牛肉扒”、“焗火腿”等菜，都非传统中菜。在糖果、糕点、烟酒方面，洋糖、洋烟、洋酒被接受得更快、更普遍，很多中国人也开店设厂生产这些洋食品。三是改进了传统的饮食方式和进餐习惯。中国人讲究聚族而居，反映到饮食上就是祖孙三代聚集而食。而西餐却是每人一套饮食用具，用公用餐具把菜弄到自己的盘里，各吃各的，不相侵扰。这种新颖、卫生的饮食习惯引起了中国人的兴趣，一些思想开放的人争相仿效。后来一些人看到用刀叉吃饭太不方便，就仍然使用筷子，但却是“中菜西吃”，即各吃各的菜，彼此之间互不相扰。四是简化、改良了中国传统的宴客习惯。中国人宴客往往讲究排场，且“礼节”颇多。西方饮食文化传入中国后，中国官场和知识界兴起了改良、简化传统筵席的风尚。民国时期这一风尚更得到提倡和普及。人们参照西方筵席的程序、规则，创制出了“改良筵席”。在席面布置、菜肴品种数量、冷热搭配、上席顺序、食用方式上都有些变化，总体上趋向俭约，可以说有中西结合的味道了。

民国时期，就其民众住宅的式样、材料、内部结构而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大多仍是中国传统的合院建筑形式。但在一些开埠较早的大都市，却出现了大量的西式里弄住宅、花园洋房、高层公寓等新式民居。

西式里弄住宅是在改造了中国传统低层院落式住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使后者由“合院”式变为“联立”式。中国最早的西式里弄住宅于19世纪末出现在上海。民国时期，由于市区人口的增加，上海的西式里弄住宅得到了较大发展，开始向多层次、大纵深发展，并增加了卫生设备，围墙的高度也逐渐降低或者被拆掉了。其时，在南京、天津、北平等城市，西式里弄住宅也有一些。而且同上海一样，里弄内有总弄、支弄，总弄通大街。房屋不太考虑方向，以适合自己为宜，建筑密度颇高。花园洋房最早建在租界，既有英式、法式、德式，也有美式、西班牙式。其占地之广，规模之大，式样之精美，较之其本国建筑亦毫不逊色。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花园洋房多为古典式或仿古形式。民国建立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花园洋房在中国大量修建的时期。上海有名的嘉道理洋房，建于1924年，是一座欧洲宫殿式的大住宅，占地140亩，建筑面积达3300平方米，因其墙面、地面全部是大理石，它也被称作

大理石洋房。而建于1934年的上海名流王伯群的花园洋房，是一座英式建筑。也是在这一时期，花园洋房开始在一些名山大川、避暑圣地大批兴建。达官贵人们每年都要抽一段时间去这些“山野别墅”度假休闲。高层公寓这种建筑，即便在欧美国家也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二三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大城市中兴建。民国年间，中国的高层公寓一般有如下特点：地址一般设在学校、大商店附近，以及城市中能够闹中取静的地区；公寓住房者多是有钱、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住户的居住时间一般较长；房租的支付多以月计。

民国时期，随着交通建设的发展，民众的出行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迁。在清末，人们的交通途径主要是陆路和水路。就陆路交通而言，土路和碎石路仍然是道路的主体，马、驴、骡、牛、骆驼等牲畜和人力或畜力车仍然是主要的代步和运输工具。民国时期，陆路交通的铁路和公路建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据统计，1912年至1937年，全国增建铁路11000多公里，平均每年兴建450多公里，全国铁路总长度达到22000公里，初步形成了旧中国铁路网的基本骨架。1921年，全国公路仅有1185公里，1922年即新修6815公里，达到8000公里，1924年增加到16000公里，1926年更增加到26111公里。5年间新修公路24926公里，平均每年修筑4985公里。到1936年底，全国公路已有69000公里，正在修建的10000公里，计划修建的30000公里。民国年间，水路交通和民用航空交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民用航空，到1937年，全国民用航空已有飞机30架，开辟航线18000公里。1929年航运飞行里程为96000公里，1936年增长为3460000公里，7年增长3倍。交通建设的发展，大大便利了人们的出行。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方式的逐渐改变，一些城镇民众的精神生活方式和交往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三

总之，民国时期作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特殊时期，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社会运行机制（包括社会生活等）都在急剧地发展、变化着，是这段历史的总态势和总特点。诚然，由于民国时期中国所处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社会在其转型过程中，呈现了如下几个特征。

其一，社会的“沉沦”与社会的“进步”共生。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国社会这种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沉沦”与“进步”共生的发展态势。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王朝，但并没有结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民国成立后的38年中，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入侵后，中国已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一部民国史，实在是一部中国社会的沉沦史。

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没有能完全阻止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步伐。在与帝国主义抗争的过程中，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封闭型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被打破，中国被迫

开始了痛苦的现代化历程。在中国逐渐融合于世界的过程中,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民国成立后的38年,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封建势力遭到严重的冲击,中国在一步步走向半封建性或半资本主义性社会。一部民国史又实在是一部封建势力的削弱史和一部资本主义的成长史。

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中国社会在一步步沉沦;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奋力抗争,中国社会在一步步转向现代,“沉沦”与“进步”共生,是民国时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大特征。

其二,“传统”与“现代”两种生活方式并存。

民国时期,是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这一特点反映在社会层面上,则致使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新”“旧”并存的局面。

一方面是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在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是广大的农村,依然保持着传统的风貌。在衣着上,既有西服革履者,也不乏长袍马褂者。在饮食上,当一些新派人物在品尝西点西糕时,更多的人仍不懂面包为何物。在居室上,当西式洋房矗立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时,更多的民居仍是传统的青砖黛瓦。

“传统”与“现代”两种生活方式并存,是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另一特征。

其三,多重统治区域的分立,使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呈现了多形式、多线条的发展姿态。

民国时期,中国政局多变。无论是北洋军阀统治,还是国民党统治,中国实际上都未真正统一过。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军阀拥兵自重。在其各自所辖范围内,军阀们往往以自己的意志影响着辖区的发展。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社会发展的态势更为复杂。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中国出现了互相分立的三个区域,即中国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和日本侵略者占领区。这是三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区域:在国统区,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日本占领区,完全是殖民地社会;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则具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由于统治区域性质的差异,各统治区域社会发展也呈现了不同的状态。在国统区,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社会发展极其缓慢;在日本占领区,由于尖锐的民族矛盾,社会在变态发展;在各革命根据地,由于共产党实行反帝反封建政策,社会发生了飞速的发展。

中国社会在多重统治区域内,呈现了多种发展态势,这是民国时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又一特征。

【作者简介】朱汉国(1954—),男,江苏武进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社会史等研究。

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

李云峰

(西北大学 历史系,陕西 西安 710069)

近年来,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学术界见仁见智,发表了许多不同的见解。根据我的认识,所谓社会的转型,就不只是“社会性质”、“社会制度”的改变,更是指社会文明形态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转变。这种转型既是社会有机体(结构)各个子系统相关互动的、整体性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呈现阶段性的变革过程。就20世纪的中国而言,社会转型就是整体性地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亦即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其基本内涵不外乎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化(包括多元所有、市场调节、公平分配),政治上的民主化、法制化,文化上的多元化、大众化,社会生活上的公民化、个性化,以及城市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可以说,中国社会转型基本实现之时,也就是现代化成功之日。这个过程从19世纪中叶“洋务运动”起步,贯穿整个20世纪,直到21世纪中叶,大体经历两个世纪。在20世纪,西方各国已先后完成了现代化,并开始由“工业社会”(以商品经济为轴心)向“后工业社会”(以服务经济为轴心)过渡。与西方相比,由于中国走的是一条被迫的外源后发型逐渐朝自觉的

自主探索型转变的现代化之路,因而其转型过程就颇为艰难,颇多曲折,总体变化速率显得相对“缓慢”(如前80年),广度与深度也不足,但其烈度及所付出的代价则更为突出。下面,我仅就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谈几点看法。

第一,制约中国社会转型的外部因素,当然首先应提到20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这个问题十分复杂,需要认真冷静地加以辨析。从总体上看,外国势力的入侵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掠夺了中国的财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阻碍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因而反对侵略和谋求民族独立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主题。与此同时,外部资本主义作为消解封建专制主义的力量,又在客观上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自然经济,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展示了高于农业文明层次的先进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精神文化,加快了中国社会裂变和新陈代谢的步伐,因而学习西方和追求现代化又成为当时中国的另一个历史主题。其实,这两个历史主题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犹如一枚银